

北京外国语大学比较文学研究丛书

他乡有夫子

——汉学研究导论

(下)

张西平 编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北京外国语大学比较文学研究丛书

他乡有夫子

——汉学研究导论

(下)

张西平 编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他乡有夫子:汉学研究导论/张西平编. —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5.7

(北京外国语大学比较文学研究丛书)

ISBN 7-5600-4993-1

I. 他… II. 张… III. 汉学—文集 IV. K207:8-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75865 号

出 版 人: 李朋义

责任编辑: 周晓云

封面设计: 彭 山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9 号 (100089)

网 址: <http://www.fltrp.com>

印 刷: 北京京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22.125 (上册 10.875、下册 11.250)

版 次: 2005 年 1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600-4993-1

定 价: 38.90 元 (上、下)

* * *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出版社负责调换

制售盗版必究 举报查实奖励

版权保护办公室举报电话: (010)88817519

汉学^①

[法国] 马伯乐著

马利红译

中国是欧洲以外仅有的这样一个国家：自远古起，其古老的本土文化传统一直流传至今；而且正如我们所说的那样，在我们抵达之前，那里早已孕育了广博的知识。由此可知，汉学是在不同于东方学其他学科的特定环境下发展起来的。事实上，我们已经发现了别的学科以及要付出极大努力才能进行的大量现成的前期准备工程：当地学者已经先于我们编撰了极好的词典、百科全书、通史及断代史、地理集、目录集、碑铭集；他们还懂得订立校勘本等。中国问题研究的总体轮廓已预先勾勒出来。我们没有必要再通过接下来的发现去慢慢地加以建构。而这也正说明了19世纪汉学历史的某些特征：比如，欧洲汉学历史的特征若不是由全部书籍、手册、参考著作所构成（英国学者曾撰写过一些，但都微不足道），那是因为中国早已有这些书了。这种状况若有什么好处的话，它对我们其实并不有利：相比其他领域，当地人的博学 and 思维更多地沉重地压在了西方科学之上，而且也只是在最近，欧洲的考证才开始挣扎着从中摆脱出来。18世纪的汉学完全是工作在中国当地的传教士的著作；人们认为除了对远东语言及文化进行现场研究外，其他方式都行不通；福尔蒙（Fourmont）为推翻这种舆论所作的尝试也失败了。然而传教士遭到驱逐后，情况发生了改观：人们不得不局限于研究书本。

^① 此文发表于《汉学研究》第二辑。

有些教科书是用来研究语言的，如弗朗西斯科·瓦罗（Francisco Varo）神甫的语法书；另外一些，则仅仅是手稿，如马若瑟（Premare）神甫的语法书和巴西勒·德·格勒莫纳（Basile de Glemona）神甫的词典。此外，皇家图书馆大量的中国丛书也使得人们能够进行对中国及其历史与文化的研究。

阿贝尔·雷缪萨（Abel Rémusat）是第一位在欧洲仅从书本了解中国而成功地掌握了有关中国深广知识的学者。他最先感兴趣的是古代中国的哲学理论。在对《四书》的注释中，他就孔子及其学派的思想提出了较诺埃尔（Noël）神甫所提更为精确的概念。而他对老子和道家哲学的研究不太成功：他重新研究钱德明（Amiot）神甫的理论并加以修正；他还确信在钱神甫曾看到基督三位一体影射的一段《道德经》中找到了耶和華名字的眷写；同时，在西欧，他从毕达哥拉斯学派信徒的身上寻找道教理论的根源，这一不当的假定只能导致他对古代中国思想历史的认识混沌不清。相反，通过语言学研究，他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他的《鞑靼语研究》是对中亚、北亚、西藏、东土耳其、蒙古、满族语言条理化分类的第一次尝试。由此，这些研究在今天虽已过时，却仍令人瞩目。至于他的《汉语语法成分》一书，是对汉语进行逻辑综合和推理构建的首次试验，而且也一直是整个19世纪汉学家们着手研究的初始教材。雷缪萨的主要作品是关于佛教的，其译作《佛国记》讲的就是中国僧人法显为瞻仰圣地，求取经书而西行印度的旅行见闻。除著作本来的意义之外，雷缪萨还提出了最重要的一个问题，而这一问题不断地掀起汉学家们的热情，这是一个关于中国和西方世界古老关系的问题，一个关于往昔世界文化相互影响的问题。还应补充一点：就他那个时代而言，这部译作是杰出的，但其中关于佛教的概念仍是相当模糊的，人们也几乎无从了解中亚的地理和印度的历史。著作未出版，作者就去世了。他的学生朗德雷斯（Landresse）在其朋友克拉普罗特（Klaproth）协助下，将该作出版。

雷缪萨著作中最不完善的是翻译：如同18世纪的汉学家一样，他

往往局限于意译；如果他能非常准确地理解整体含义，那并不是由于他赖以运作的正确的句子分析，而是由于一种时而惊人的直觉。然而，有一点不应该忘记：他44岁去世，其科学活动仅仅持续了15年。他是法兰西学院第一位汉语教授，从1815年开始在那里授课，一直到1832年去世。他的学生斯坦尼斯拉斯·于连（Stanislas Julien）接替了他的工作监督并指导法国汉学大约达半个世纪之久。

于连的著作数量大，内容丰富；他坚持不懈的工作接连为他带来了最多样化的课题；如果他为钟爱的汉语结构这一研究课题的进展投入了大量的工作，那么他的这种偏好并没有限制他的研究范围。最初，他研究古汉语，然后着手《孟子》的拉丁文翻译。该译著于1824年开始出版，在1829年才全部完成。从这部著作起，他的首要品质明确地显露出来，即对翻译最大程度严谨的关注。他很快就丢开这些已为从前的传教士研究过的众所周知的著作，而向尚未译过的古典书籍进军。他花了许多年为他未完成的译作《礼记》做准备工作。然而，他却成功地翻译了老子的《道德经》，该书从这一时期开始翻译，大约十五年左右才完成。与此同时，从他的事业一开始，他就为另外一类书所吸引。雷缪萨译过几部中国短篇小说，他的学生纷纷效仿。今天我们不太明白为什么前期的汉学家，不论是英国的还是法国的，都在这类往往难懂的作品上予以莫大的关注，而它们平淡无奇及其普通的结构几乎不能抵偿译者艰辛的劳作；要理解这一点，应该参照当时的时代背景。那个对外闭关锁国的中国不允许汉学家去直接接触它的风俗习惯，而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是人们能看到各阶层中国人活动和生活并了解他们的思想和情感的唯一途径；只是在中国开放以后，人们才可以直观地研究中国社会，而对长、短篇小说的翻译也才慢慢中止。于连首先翻译了《复仇豹》（1824年），接着又译了几篇《今古奇观》中的短篇小说，《孝顺的英雄主义》（1827年），《家庭的画像》（1830年），最后还有长篇小说《白蛇与青蛇》或《两蛇仙》（1834年）。与此同时，他正着手译一部比中国长篇小说更有趣的著作，一部由马若瑟神甫于1731年运回巴黎的

蒙古时代的剧本集子《元人谱春秋》。他很快就意识到其价值，并开始翻译各式各样的剧本，先是《灰阑记》（1832年），之后是《中国孤儿》（1834年）。这后一部剧本由马若瑟神甫以《赵氏孤儿》为剧名灵活自如地译出，并由杜赫德（du Halde）出版，在法国文坛上曾轰动一时。伏尔泰的悲剧也从中受到了启发。第三部剧本《吝啬鬼》也由于连译出，但没有出版。他还打算翻译另外两部剧本，但没能实现其计划。他的学生巴赞（Bazin）继续他的译事，首先在他的《中国戏剧》（1838年）中出版了选译自同一集子的四部剧本，几年后又出版了《琵琶记》（1841年），最后在他的《元代》（1850~1852）一书中，对这部中国集子进行了全面研究，并附以详细的分析、其中13部剧的选段以及对作者的简介。而于连则是在他晚年才又回到中国长篇小说和戏剧的研究中：他翻译了《两表姐妹》或《玉娇梨》，接着又译了《西厢记》，该书最后一部分在他死后才出版（1873~1878）。

于连放弃了文学著作的翻译，而应土木工程、农业和商业部长的要求，负责把中国养蚕的方法应用到我们的桑蚕养殖中（1836年）。为此，他翻译了与这个问题有关的《缫车通考》的一些章节。几年之后，他又以对湖北省桑蚕养殖的简短笔录完善了这一译著。该译著取得了巨大成功，并且在不到十年间被陆续译成意文、德文、英文、俄文和希腊文。这一成功促使于连开始了一系列有关中国人的技术方法的研究：他研究中国各种墨的制法，之后又研究纸张的制造，然后转入别的工业；首先在他关于裂纹搪瓷的论文中，然后又在他关于中国瓷器的历史和制作的重要论著中，翻译了有关瓷器制作的一些片段。后一篇是应塞夫勒的制作工场总管埃贝尔蒙的要求写的，开始于1851年。最后还发表了一系列关于苧麻及其作为纺织纤维使用的笔记。去世前，他几乎没有时间汇集整理关于《中华帝国的古老工业和现代工业》（1869年）著作中散乱的笔记，也没有时间增补关于不同主题的其他摘录从而使之完善，如植物和矿物的颜色、金属、化肥、茶等。

整整这么长时间他主要是在为翻译玄奘的旅行和生活见闻做准备工

作。于连还因此开始对那些从前的佛教朝圣者留给我们的最长最难的书籍进行研究。其中,根据那些朝圣者的表述,他们是为了去找寻西方的律法。只有将于连的作品和三十多年前雷缪萨翻译的《佛国记》比较,才能最充分地体现他为汉学带来的进展。这是由西方学者自己动手建立除中文评论外的资料和评注而不囿于跟随当地学者亦步亦趋的第一部著作。他将这部巨作依次分为两部著作出版,首先是《玄奘的生活故事》(1851年),然后是《关于西部地区的回忆录》(1856年);这部关于7世纪印度的详细描述使人们对该国历史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准备明白的翻译加之梵语词汇表达的科学的严密性,为印度学家们打下了一个稳固的工作基础。

翻译《西域记》促使于连进行多方面的研究,他以不同形式发表了一些最重大的成果。他先在《亚洲日报》上陆续发表了其关于中亚书目摘要、历史和地理的笔记,之后他重新整理这些笔记并编入他的《亚洲地理和中印哲学杂集》(1864年)中,而同一时期他开始出版他的《关于突厥的历史文献》(1864~1867),以致整个地形成了伊斯兰教文化之前中亚历史的引论。另一方面,在《西域记》翻译过程中,他更进一步研究了关于用汉语缮写外国人名或地名,尤其是印度人名及地名的问题;他的研究成果成为最实用的著作之一,即《辨认和缮写汉语书中梵文名字的方法》(1861年)。这是一部完全凭经验得出的集子,是借助大量例证和用梵文缮写汉字的现代价值点滴积累而成的,而并没考虑它们的发音可能随时代不同而发生变化,其中除此之外,不同时期的资料还和属于不同缮写系统的资料并置在一起,然而,这是第一本对经过核实的确切事实的汇编,使他们即使不能肯定地找到梵文词汇,至少可以排除不符合实际的文本修复;至今该集子仍是所有致力于佛学研究的汉学家们的指南。

于连的一大优势是他译介的准确。他的第一部译作《孟子》已经打上了这一烙印。他在研究之初就对汉语句子中词语在不同位置所起的作用印象颇深。马尔斯曼(Marshman)的《汉语语法成分》中有一章

使这个概念尤为突出，并将其表述为《光的特征》。他为确定和证实英国传教士提出的含糊的原则所付出的努力给他的语法研究提供了一个分类的方向和原则。从1829年起，继翻译《孟子》之后，他出版了关于四个小品词的一小本笔记，并通过例子和与满语译作的对照，指出了到那时为止仍鲜为人知的这些小品词的确切价值。在教学过程中，他总是强调严密性。为了稳妥地理解文章，人们应该按照这种态度来运用汉语构建的规则。而这正解释了他与鲍吉耶(Pauthier)之间激烈的争论。鲍吉耶是本世纪初一位过时学派的代表；正如亚森特·比彻兰(Hyacinthe Bitchourin)神甫所说，一方面，对汉语的结构有一个错误的概念，努力以推测的方式来弥补其欠缺的知识；另一方面，缺乏雷缪萨那样的能绕开暗礁的思想的正确性和直觉的力量，他最终不可避免地出了些差错；他拙劣的译著遭到于连彻底的批判；他最好的一部著作《马可·波罗》也是在他那个时代起过一定作用的另外一部仅有的作品，其中不包含任何原文翻译，只是就德·马亚(de Mailla)神甫《通鉴纲目》的译文做了一个概述。这就是发行于《风景如画的世界》(1837年)丛书中的《中国》一书，该书是关于这个国家的稗史；而其他所有古典作品的译著，或现代官方资料的译著，或关于中外历史作品的译著，都由于对语言的无知而变得毫无用处。如果说于连丝毫不能宽容他的对手，那是因为他意识到自己为汉语知识带来了某些新鲜的东西，并指出人们只有遵循不可僭越的严格规则才能准确地理解和翻译；而且也是因为他不能让这一基本发现有任何疑问。此外，在这场长期争论中获胜的结局使于连能够更为清晰地阐明其理论：在《汉语新句法》(1869年)中，他明确陈述了这些规则，并辅以大量例证；这本书从此不容置疑地最终建立了方法的依据。

于连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学生，他们都留下了重要的著作。但不幸的是，他们都几乎年纪轻轻就先其尊师而亡了。上文我提到过巴赞关于中国小说和戏剧的著作。人们知道这两类作品在中国都是以一种接近口语的语言写的；巴赞首先在其《关于通俗汉语普遍原则的论文》(1854年)

中，然后又在其《官话语法》(1856年)中，更条理更详细地阐述了这一语言的语法理论。此外，他与艾杜阿尔·毕奥(Edouard Biot)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中国历史的研究成果，而他们的老师对此并不感兴趣；这些研究往往相互增补，相互交织，几乎不能将它们分开来研究。他们二人都对机构历史的研究格外感兴趣，如行政和市政机构，修会的设立，国民教育和学校组织机构的历史，地产制度，军事殖民等。毕奥偏好溯源历史：他翻译了写在竹简上的编年体史书《竹书纪年》(1841年)，这是关于中华帝国最初时期的最古老的历史记载；在《关于公元前12世纪中国政治结构的论文》(1844年)中，他研究了传说的周代政治组织。他有关中国古代最重要的作品是对周代行政礼仪书《周礼》的翻译(1851年)，无论从其涵盖面还是其准确性看都是一部杰作。遗憾的是他的早逝没能使他目睹这一作品的最后完成。他的大部研究都贡献给了中国的天文学：他相继出版了《流星目录》(1841年)和《中国观测到的彗星目录》(1846年)。另一方面，他为其父天文学家让-巴蒂斯特·毕奥(Jean-Baptiste Biot)提供了资料，而后者借助这些资料，二十多年里在关于古代中国天文学的《学者日报》上发表他的论文以及他的《关于印度和中国天文学的研究》。

晚年时的于连看到了中国在逐步对外开放；港口的领事，内地的英法传教士开始与西方恢复了中断半个世纪的联系。当这位法国学者去世时，莱格(Legge)刚刚在香港出版了他的《中国古典作品》(1861~1862年)，这部著作指明了新形势可能为汉学家提供的研究资料。然而不幸的是法国汉学家并没有从中受益。于连最出色的两位学生毕奥和巴赞都先他而去，前者死于1850年，后者死于1863年。狄奥多尔·巴维(Théodore Pavie)和埃尔维·德-圣尼(Heruey de St-denys)都没有能取代他们二位的才华。接替其导师在法兰西学院任职的这份沉甸甸的荣誉落在德-圣尼身上。他从教二十年(1874~1892)，几乎没为法国科学增添多少色彩，而是渐渐被这一时期的一大批杰出的英国学者遮没了，他们是怀利、莱格、瓦特斯、马雅、埃德金以及美国学者威尔斯·威廉

姆斯。德-圣尼缺乏于连那样的翻译的准确可靠性,另一方面,他也没有考证意识。中国诗歌让他着迷,他翻译了其中有趣的两篇:一篇是中国古代留给我们的最美的诗作之一,屈原的《离骚》,这首诗是真正地烙上了人的印记并能使得从中感觉到人的存在的为数不多的诗作之一;另一篇是几首唐诗,这些唐诗较其以后时代的诗歌有更自由的韵律,而且也不很学究气。这毕竟是德-圣尼最优秀的两部作品,尽管他的翻译水平有待不断提高。他的《中国外族人种志》是对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中异域概述两部分的翻译。这部译作很糟糕,评论非常贫乏,定位相当冒险。

如果说法兰西学院的教学竟如此衰落,那么东方语言学校的教学就更谈不上成功了。该校于1841年开设汉语课。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的闭关锁国使人们不得不放弃对口语的研究,没有人学习过当时使用的满语;人们不得不求助于一些学者,如巴赞(1841~1861年)、于连(1863~1871年),而他们的知识是纯理论的,传授的是小说中的矫饰语言而非日常生活用语。甚至当克莱克考斯基(kleczkowski),这位曾出驻中国的伯爵替代于连时,也没有考虑把一种新的精神引入教学,在他为其学生编的《渐进的全面的汉语课程》(1876年)中,没有利用自己的语言知识而是令人费解地去贡萨尔维斯(Gonsalvez)古老的《中国艺术》中寻找例证。在这个时期,英国学生已使用瓦德(Wade)优秀的教材《自述集》有九年了。改革口语教学的积极性重又落回到在中国的法国人身上;有两部著作几乎同时出版:昂波-于阿里(Imbault-Huart)的《北京话实用和渐进的课程》(1887~1889年)是第一部很好的法语版的满语教材;另一部是由布歇(Boucher)神甫翻译的题为《满语指南》的教授北京话的日语课本(1887年)。

其实,这一时期定居中国的法国人已经开始就地进行各种各样的研究了:卡勒里(Callery),前遣使会传教士,拉格尔内使团的翻译官(1841年),他的努力提早结出了硕果,他的《汉语经文语音体系》一书于1841年出版于澳门。如果他曾对教学法有一定影响的话(似乎在英

国胜过在法国),那么他在他的那个时代也完全是势单力孤的。从1865年起,曾于1860年陪同探险团一起到过中国的德·劳居尔(d'Escayrac de Lauture)在他的《关于中国的回忆录》中做了关于这个国家历史、宗教、政府和风俗的简单扼要而又准确的笔录。不过,有趣的是这些在中国的大部分法国人对书本研究而非他们眼前的人和物更感兴趣,以至于建立在个人观察之上的研究在他们的作品中很鲜见。昂波-于阿里,我刚才提过这个名字,他是著作最为丰富的作者之一;他关于《道教第一师祖的传说》的文章(1884年),涉及道教渊源这一棘手的主题;而且他关于17、18世纪中华帝国与其邻国外交关系和战争的作品翻译有助于人们更好地了解这个国家的现代历史。达柏理·德·蒂耶让(Dabry de Thiersant)在致力于撰写他的《中国医书》(1868年)之后,又在其《伊斯兰教在中国》(1878年)一书和许多文章中概述了穆斯林大暴动次日伊斯兰教的状况;爱弥耳·罗歇(Emile Rocher)编撰了题为《中国云南省》的专题论著(1880年)。除历史外,远东艺术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不幸的是其间并没有多大分别;帕莱奥洛格(Paléologue)编写了一本《中国艺术》(1887年)的小册子,该书对绘画与雕塑的介绍很不充分,然而关于工业艺术、陶器、漆器、石刻等的编写却相当简明。这一时期法国汉学家的不足之处还在于:没有为远东研究创办杂志。在整整半个世纪,《亚洲日报》满足了于连及其学生作品发表的需要,但是东方学各支派的迅速扩展促使它们都创立了自己的专门机构。亨利·考狄先生(Henri Cordier)尤其感觉到这一点。他首先创办了《远东杂志》(1883年),但此杂志没有生存下来,然后他又创办了《通报》,这一杂志取得很大的成功且很快成为首屈一指的汉学杂志;考狄先生出任该杂志主编,先与施莱格尔(Schlegel),而后与沙畹(Chavannes),现与伯希和(Pelliot)先生合作,接连在杂志上发表了大量长篇的文章。考狄先生的作品更多是关于中华帝国的对外关系而非其自身的历史,他将他繁忙的一生大部分时间花在了官方文献的出版上。他的《中国与西欧列强关系之历史》(1901~1902年)一书,以其文献资料的翔实性和

广泛性为我们认识这一复杂问题奠定了可靠的基础。此外，不单是近代，蒙古时代也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发表了《幸运的修士奥多里克·德·波尔代诺内亚洲游记》（1891年）并附以大量注释，然后他重阅并完善了尤尔（Yulle）的《马可·波罗》（1903年）第三版，以及同一位作者的《契丹和去往彼处的路》的第二版；先前他还研究过《法国国王夏尔五世的卡塔卢尼亚地图册》中有关远东的部分。这一类研究的另一支派也吸引了他，即目录学。西方世界和远东日益密切的联系促成了这类作品的大量出版：他挑起了《汉学藏书》中盘点罗列有关中国的所有欧美文学的艰巨任务。另外，他还热衷于那些同时涉及两个世界并使之对峙的问题。不过，这并没有使他完全偏离中国课题的研究。他刚以《中国通史》（1921年）为题发表了一篇关于该国的报告，这是第一篇不仅仅是简单地对汉语书籍进行翻译或分析报告。

《通报》的创立为汉学研究提供了发展所必须的工具。取代圣-德尼在法兰西学院位置的沙畹指导并进行了法国汉学研究，而这正是自于连去世后一直需要填补的空白。这位新上任的教授从中国一回到巴黎，就相继出版了两部鸿篇巨制，他一直在不断地发表作品直到去世。如同于连一样，或者比他更进一步，沙畹致力于汉学各支派的研究，并为汉学开辟了新的道路。他尤其为汉学带来一种新的思想，一种考证的方法，这种方法得益于半个世纪以来历史科学以其精确性与严密性取得的一切；同时，由于曾居住在中国，他深刻感到同中国社会保持直接接触而不是把它作为一种静态的文化来研究的必要性。这双重特性渗透全书，并使该书很快列入榜首。

事业之初，沙畹就试图翻译巨著《史记》，他工作了整整一生，几乎将该著作全部译出。该书是司马迁关于从人类发祥到他那个时代的古代中国历史的记录。然而大量的注解和最后的出版进行得并没有这么快，他只完成了大约一半。书中他论述了在其作品中占主导地位的考证和历史观的益处。这部自莱格的《中国古典作品》以来欧洲汉学界最重大的著作也是沙畹主要的历史著作，但这并不是他唯一的著作。

他的研究活动还包括别的；他探讨中国省份历史的各式各样的问题，如10世纪浙江吴越国的历史和云南丽江的历史等。最后他对中亚地理和历史产生了持久的兴趣：他的《关于西突厥的笔记》（1903年）和第二年接着出版的《关于西突厥的补充笔记》补足了于连的一部旧作。此外，他还附以大量注释翻译了《魏辽之后的西方国家》（1905年）和《后汉初年之后的西方国家》（1907年）。

在研究古代历史的过程中，他效仿研究地中海文明的历史学家，增加了考古学和碑铭学研究并努力以此拓展了其不很开阔的研究根基。逗留中国期间，他搜集了一系列出自山东墓碑的石刻图案，并从中为其《汉代石刻》汲取了素材；通过饰有图像的纪念碑和文学作品的比照，二者成功地得以相互阐释。通过在北部中国的考察，大约十五年后他又重提这一主题；他的著作侧重于该地区的考古遗迹，如以山东发现的汉代纪念碑和唐帝王陵为代表的非佛教雕刻以及尤以云岗和龙门石窟为代表的佛教雕刻。

对司马迁的译介使沙畹相信宗教思想在古代中国文化中占有重要位置。这个问题反复地吸引了他并促使他写出一部关于《土地神》的杰作。该著于1903年第一次出版，然后经修改润色于1910年再版。其中通过对把封地作为基本膜拜的所有表象的研究，揭示了封地和授封的汉语概念中的宗教特征。现代宗教也同样令他感兴趣，他发表了一篇关于东方之巔祭祀的优秀专题论文集《泰山》（1910年），然而他在宗教历史的研究中所付出的最大努力是在佛教上。首先，他重阅了雷缪萨和于连的译著，并翻译了中国有名的朝圣者第三次去印度的旅行见闻《义净》，然后又在《通报》上发表了几位不知名的朝圣者的传记和一些中国的印度传教士的传记。²³另一方面，中国佛教思想的历史尤其令他感兴趣。在与西尔万·列维（Sylvain Lévi）先生合作的关于《十六罗汉》的文章中，他尝试对一系列信仰的起源和演变作出界定。最后，他一直偏爱的课题之一是印度起源的中国民间传说，这是一个与佛教密切相关的问题：他搜集、翻译并以《选自中国〈大藏经〉的五百寓言故事》为题出版了大

量的故事（1910年）。

沙畹英年早逝时正值他的研究最有成果之际（1918年），他的工作就此中断。然而比于连幸运的是，他至少在一个知名的人数众多的学派中得以再生。他是一位无人匹敌的大师，在他从教的二十年中，培养了众多学生，艾杜阿尔·于贝尔（Edouard Huber）、谢阁兰（Segalen）、保罗·伯希和先生、葛兰言（Granet）先生、亨利·马伯乐（Henri Maspero）先生和莱奥那德·奥鲁索（Léonard Aurousseau）先生；勾勒现代法国汉学的图画只是为了指出继沙畹之后工作于不同的科学分支中的他的学生，其中他曾为他们指明了道路。

自20世纪初始，中国问题研究由于远东法语学校的创立而变得容易起来。该校于1898年由当时的印度支那总督杜梅尔（Doumer）先生创建。事实上，这一科学机构，由于不停扩增的图书馆和博物馆加之其成员所负的使命，在法国汉学界取得了最高声望。其杂志《远东法语学校公报》从一开始就得到了一个公正的科学的声名。最终，1912年由碑铭和纯文学学院创作的《东亚回忆录》和戈路堡（Goloubew）先生创作的《亚洲艺术》，这两套新的丛书尤其便利了刻版和插图的发行。

伯希和先生既是沙畹最早的学生又是远东法语学校的创办者之一。他有着非常充实的职业生涯。起初，他在印度支那的居留促使他对与这个国家有关的作品进行一番研究；他首先翻译了《周大宽关于柬埔寨的论文》，然后是中国历史学家写的有关印度支那各国的文章片断，扶南、班图兰卡等；不久，他又在其巨著《8世纪从中国到印度的两条路线》（1904年）中着手进行中国与印度支那以及马来群岛关系历史的研究并进行地名核实这一棘手问题。资料的广泛性和确凿性是伯希和先生全部作品的特征，而这一点在该著中是显而易见的。同时，他并没有疏忽中国问题：佛教和道教启发他做了许多关于白云教和白莲教以及《牟尼和化胡经》的笔记；目录学尤其吸引了他，他渊博的中国文学知识使他能够写作重大系列的《汉语目录学摘录》。他在中亚考察结果的发表以及在法兰西学院的提名，都自然而然地帶他进入这一新的领域进行专门研

究；但他没有停止他纯汉学的研究活动，而且这一研究还在各个领域铺展开来。佛教成为他许多文章的研究对象：在《围绕〈道德经〉的梵语译介》中，他研究了佛教徒和道教徒长期争论过程中一段奇特的插曲；尤其是在最新译作《墨子》或《理惑论》（1918~1919年）中，他以丰富的笔记拓深了汉代佛教历史中最复杂的一些问题的研究。古典书籍启发他进行一项非常重要的研究，即关于《书经》的真实性及其原文《古文书经》和《尚书诗文》历史的研究（1916年）。弗朗克出版的《耕织图》使他重新勾勒出插配该著的系列古老图画变迁。另一方面，中世纪中亚宗教历史上占重要地位的一个外国宗教——摩尼教，成为他与沙畹长期合作的研究对象。他们合著的《从中国找回的摩尼教论著》是对该论著附加了冗长注解的翻译，是一部关于教义的重要著作；其中收集了中国的关于这一宗教的所有作品，并使人们对其发展及历史的研究成为可能。

艺术考古和艺术历史大概是在最近这几年受到了最广泛最多种多样的研究：雕刻、绘画、音乐，终于在沙畹之后，吸引了到那时为止仍集中于瓷器和漆器上的注意力。沙畹的一名弟子，维克多·谢阁兰勘探了长江流域的两端，发现江苏有五六世纪的帝王陵而四川有汉代的雕刻遗迹；遗憾的是他于战后不久就去世了，他的早逝延缓了其工作成果的出版。沃德斯卡勒指挥官在离北京不远的地方发掘到一组可以追溯到辽代的碑铭。亨利·马伯乐先生在《远东法语学校公报》上研究了残存于杭州附近和浙江北部宋、元时代的古迹；最近，布亚尔（Bouiard）先生在同一份杂志上发表了关于《明帝王陵》配有精确插图的详实叙述，这是他经年累月认真记下跟踪笔记的结果。建筑历史，尤其是雕刻历史总体轮廓呈现的同时，中国绘画也特别地吸引彼得鲁西（Petrucchi）。这位比利时学者将艺术品味与科学考证结合起来，通晓并尤为深刻地感知了中国艺术。他的第一部著作，或许也是最有特征的一部著作是《远东艺术中的自然哲学》（1911年），该著是应用于艺术的心理学研究；之后他出版的《中国绘画》（1912年）一书，为绘画历史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指

南。当他正值壮年去世时，才刚译完一部重要的教育用书《芥子园画传》。他和他的朋友沙畹，后者虽重病在身仍和他一起去监督该书的印制，但都没有看到最后出版。该书是在最近发行的。最后，库朗（Courant）先生的整部著作是就音乐进行的卓越研究，这里指的是他的《中国音乐》。这是一部非常完备的著作，不仅涉及到乐器和技巧，还有音乐的内容及其历史。

自然科学的历史并不像艺术的历史那般发达；应该承认中国科学远不如其艺术有价值。然而旺内（Vanné）神甫进行了数学方面的研究；而利奥波德·德·索绪尔（Léopold de Saussure）先生15年来就《中国天文学的起源》写了一系列研究作品，其中他尝试阐明了中国天文学古老而独特的特征。

近几年来，人们在佛教研究中对中国渊源的重要性认识产生了一个全面的更新，建立了新的方法。既考虑到佛教经书被不同语言改写编译的事实，如用梵语、巴利语、藏语、汉语编译等，又考虑到这些存留的文章往往都属于一个单独学派的事实，故而强调校对不同语言版本的必要性，它首先是为了确定原文，然后是为了能随时对异版进行比较。这一新方法的发起人是列维先生。尽管学习这么多语言的必要性为这一课题的自然难度加设了重重障碍，这位印度学者并未对汉语的研究感到灰心，并且还成功地培养了一些学生。在他的《关于印度的汉语笔记》和别的文章中，为了澄清印度佛教历史中的某些问题，他就这一方法列举了许多例子：他和于贝尔几乎同时得出关于限定佛教中十二处原始资料的相似的结果。后者是远东法语学校的成员，在考察中身亡（1914年），这对于我们的研究是一大惨重的损失。通过对《入楞伽经》（1906年）中文版本的翻译，于贝尔为印度文学提供了遗失于原版作品中而仅仅以异版形式存留下来的文学名著的知识。佛祖的生活是考证学研究的对象，普日武斯基（Przyluski）先生曾专门研究过与佛祖圆寂有关的神话传说。另一方面，单单是对中文版本的研究就能让诺埃尔·佩里（Noël Peri）先生解决其关于《世亲的日期》一文中非常有争议的一些年代问题。佛